

The Evolu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itles in China: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職業教育稱謂的中國演進—基於歷史的考察*

楊永兵 Yang Yongbing 毛莉萍 Mao Liping 龔自力 Gong Zili

雲南大學 職業與繼續教育學院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and debate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names can be seen as a complex cultural phenomenon. This phenomenon includes not only the conflict between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but also the conflict between various foreign cultures. It is because of these conflicts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nam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finally become a matter of linguistic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am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b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mining contempor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only with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kind of education, can the complex issue of the name dispute be resolved.*

Keywords: *Industrial Education, Technical Education,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 基金項目：雲南省 2022 年度研究生優質課程建設項目《教育史》(2022SJYZK17)。

I. 前言

孔子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提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¹。在某種程度上說，正名是學術研究的原點。孟景舟曾指出：“職業教育名稱問題，是職業教育學科建設中的一個核心問題。”²職業教育是中國在近代才從西方國家引進的一種教育模式，與國外相類似，職業教育一詞在中國也一直飽受爭議。職業教育雖然是一個舶來品，但在中國的實踐可追溯到原始社會中的傳統學徒制，最遲至唐宋時期已經在手工業、商業中出現了有確切文獻記載的傳統學徒制職業教育³。經過近代洋務運動的新式教育的拓荒，再經歷二十世紀初的實業教育實踐，中國的職業教育最終才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確立，並在中國社會中產生比較廣泛的影響力。總的來看，近現代

¹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142頁。

² 孟景舟. 關於職業教育名稱的百年之爭 J. 職教論壇, 2011(16).

³ 中國古代、近現代行會情況可參閱全漢昇所著的《中國行會制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以來，中國在職業教育實踐中曾使用過實業教育、職業教育、技術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等指代其稱謂。一百多年來職業教育名稱的爭論，其實反映出職業教育實踐的推進和理論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也反映出職業教育研究旺盛的生命力。“任何問題的爭論最初基本上都是概念之爭，最終也還是概念之爭”⁴我們認為，職業教育名稱變更並不是單純的稱謂改變，而是該概念從內涵到外延都產生了極大的變革過程，這種變革往往與中國職業教育所處的社會形態、社會環境、歷史文化傳統等都有緊密的關係。我們試圖從職業教育概念外延中的時間視角入手進行探討，以期能拋磚引玉。

II. 傳統學徒制與實業教育

1. 傳統學徒製

教育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從廣義上來講，只要人類產生，教育也就產生了。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勒圖爾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著的《動物界的教育》一書中，從生物學的角度認為動物生存競爭的本能是教育產生的基礎。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教育家孟祿在《原始部落及其最簡單形式的教育》的書中對“生物學起源說”進行批判，從心理學的角度認為兒童對成人的模仿是教育產生的基礎。蘇聯的教育研究學者米丁斯基和凱洛夫在批判了“生物學起源說”和“心理學起源說”後，依據恩格斯的專書—《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認為教育起源於勞動。在原始社會中，勞動主要表現為物質生活資料的獲取，人們積累了一定的生產和生活經驗后，需要把自己的技能、技巧傳承給後人，這種傳承限於當時的社會條件，只能傳給以血緣、姻緣和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小範圍的後代，這種傳授生存勞動技能的教育形態就是傳統學徒制，是職業教育的雛形。

原始社會中產生的傳統學徒制職業教育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嬗變，一直延續至今，其教育的核心內容基本穩定，主要由師傅、學徒和技藝三個要素組成。傳統學徒制教育下，師徒之間在拜師前大多已經存在血緣、親緣、地緣和熟人等比較密切的人際關係。拜師時通常都需要準備一定的錢財和禮物，並遵循一定的程式、按照一定的儀式來進行拜師禮儀，使得學徒和師傅之間建立起一種類似於親緣關係的緊密師徒關係。拜師后，學徒便跟隨著師傅共同工作和生活，通常要無條件地為師傅勞動，並且承擔各種雜役；而師傅則有義務把自己的技藝傳授給學徒，並把

⁴ 翟海魂.《發達國家職業技術教育歷史演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第7頁。

學徒培養為像自己一樣能夠在該行業中生存的獨立的經濟個體。值得強調的一點是，在傳統學徒制教育中，師傅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出於“教會徒弟就餓死師傅”的現實顧慮，除自身的努力之外，學徒能夠學到多少技藝和經驗，主要還是取決於師傅。

傳統學徒制能在世界各地經久不衰，有其獨特的內在優勢。在傳統學徒制中，師傅一般就是作坊主，學徒就是雇員，作坊、店鋪等就是教育的場所，生產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這不僅有助於學徒更好地進行職業技能訓練，做中學，在學習技能的過程中既能夠掌握技能又能積累經驗；同時還能保證學到的技術是被限定在行業範圍之內的，能較好的適應傳統手工業生產、商業經營活動的特點與需求。但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尤其是工業革命後機器生產的興起，生產活動的標準化與擴大化，對技術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提高，傳統學徒制培養的人才知識文化水準受限且無法大規模培養，越來越難以滿足工業化生產活動對批量化技術型人才的需求，因而逐漸退出職業教育的主體，學校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日趨成為職業教育的主流。

當然，作為從原始社會產生，一直延續至今的傳統學徒制職業教育具有獨特的價值，它特別適應於個人化、小規模化人才的培養，諸如大國工匠、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純手工製作工藝品人才、技能大師、勞模工匠等。

2. 實業教育

19世紀60初至90年代中期，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以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需要，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地主階級開明派在中國掀起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肇始於1860年曾國藩設立安慶軍械所，在中日甲午海戰後趨於停滯。在持續30多年的洋務運動中，洋務派先以“自強”為口號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創辦新式軍事工業，訓練新式海陸軍；後為了解決軍事工業中的資金、能源、原料和運輸問題，又以“求富”為口號新辦輪船、鐵路、電報、紡織、採礦等各種新式民用工業。為了順利解決洋務運動中所需的人才問題，洋務派一方面選送學生出國留學，一方面效仿國外創辦新式學校，開設專門學堂，培養翻譯、軍事和科技人才。其中，左宗棠於1866年奏請在福建省福州市設立的福建船政學堂，因其學習“洋技”培養製造和駕駛船舶人才，而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技術學校。⁵此後，全國各地陸續興辦了一批新式軍工學堂。如1867年創辦的上海江南製造局附設機器學堂，1887年創辦的福州電氣私塾，1892年創辦的天津軍醫學堂等。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設立

⁵ 俞啟定.《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2頁。

的新式學校有別於傳統的科舉應試學校，為近代中國培養了第一批本土新式專門人才。但限於洋務運動的影響力和對西方新式學堂的認識和引進的不足，這一時期的新式學堂的專業範圍多以軍事為主，鮮有民用，學堂管理多為照搬套用缺少本土化，還缺少相應的保障和制度規範，並沒有內化為國家的教育體系。

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於 1868 年，比中國的洋務運動還晚了 8 年。然而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曾經是中國學生的日本卻擊敗了中國。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徹底將清朝統治的落後與腐朽暴露了出來。中日甲午戰爭后，中國社會引發了向日本學習的思潮，其中就包括實業教育。1896 年，由江西士紳蔡金台提議，張之洞上呈《江西紳商請辦小輪、瓷器及蠶桑學堂折》，擬設立中國近代第一所實業學校——高安蠶業學堂（該學堂雖獲得了朝廷的批准但並沒有正式招生）⁶。資產階級維新派創辦的學堂與地主階級洋務派興辦的新式學堂有很大不同，它不再依附於某個機構，而是獨立設置學校；培養的人才也不僅是滿足軍工需求，而是與國民生計密切相關的民用實業教育為主⁷，其主要服務於民族資產階級開辦的各類企業。雖然由於清政府中保守派的阻撓，1898 年，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戊戌變法最終宣告失敗，但自此之後，清廷的目光不再局限於軍工學堂，也慢慢開始重視民用技術的教育和培訓了，這為傳統學徒制教育向實業教育的成功轉變打下了堅定的基石。

至二十世紀初，雖然“洋務運動”中創辦的造船、器械、鐵路、礦山等傳授技藝的學堂已經走過了幾十個年頭，但一直沒有一個固定的用以總括其事的稱呼，只是籠統地與同文館、算學館等一起視作“西學”。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此類機構數量較少，門類分散，尚無統一的管理與規劃；二是由於早期各類新式學堂往往面臨著傳統文化的激烈排斥，聲名不揚。據現有材料來推斷，夏偕復於 1901 年首先使用“實業教育”⁸。從制度層面上看，1904 年清政府頒布的《癸卯學制》將實業教育制度作為其必要的組成部分。因此，一般認為實業教育是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的正式開端。儘管 1904 年的“癸卯學制”以及之前頒布而未曾實施的“壬寅學制”都只有“實業學堂”而未見“實業教育”之名，但在時人議論當中，“實業”二字已經迅速壓倒了一切，無論是先前宣導“農工商學”的張之洞、嚴復，還是鼓吹“專門學”或“藝學”的康

⁶ 張文襄公奏稿(二十七). 江西紳商請辦小輪、瓷器及蠶桑學堂折.

⁷ 吳國榮. 《清末民初職業教育研究》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 37 頁.

⁸ 劉桂林. 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有為、梁啟超。到 1906 年，這些思想界的領袖都開始大談特談“實業教育”，而其他類似的名詞，如“職業教育”則只能處於“潛流”地位，乃至湮沒不聞。⁹

1911 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民國政府隨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學校教育的檔，史稱壬子癸醜學制。與清末的癸卯學制相較，這一新學制的實施使實業教育得到了穩步的發展，但發展狀況仍然遠不及普通教育。壬戌學制的實施並沒有緩解實業教育的尷尬處境，既沒有到達預期的效果也沒有獲得相應的成就。當時的實業學校畢業生“有以畢業於紡織專科，而為普通小學圖畫教員者矣；有畢業於農業專科，而為普通行政機關助理員矣；甚有留學歐美大學校專門畢業，歸而應考試於書頁機關，充普通編譯員者矣。所用非其學，滔滔皆是”。學生雖然接受了實業教育，但由於實業教育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盲目辦學，使得學生往往所用非所學，畢業后所從事的工作或專業不對口或毫不相關。黃炎培認為，實業學校畢業生嚴重失業的原因包括“一曰其設置拘統系而忽供求也；二曰其功課重理論而輕實習也；三曰其學生貧於能力而富於慾望也”。¹⁰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實業教育的發展狀況並不理想且面臨著諸多的窘境。

實業教育英語為 industrial education，本義限於工業教育。實業教育是立足於近代中國的救亡圖存，並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實業救國熱潮的推動下發展的，但限於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弱小，實業教育制度的實施並沒有解決國計民生問題。事實上，在當時混亂的政局和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下，任何先進的教育也無法創造奇跡。但是，沉浸在“教育救國”迷夢中的近代先驅們，卻寄希望一種更加完美的教育制度來改變“民生凋敝”的現實，而這種教育制度便是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英語為 vocational education，是指學成后可以直接謀生的教育，比實業教育包括的範圍更廣闊，更能適應近代中國落後的生產力。¹¹1917 年 5 月，隨著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上海的成立，職業教育取代了實業教育。

III. 職業教育

1. 清末民國時期(1904-1949 年)

⁹ 張宇. 論“實業教育”到“職業教育”稱謂的轉變 J. 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03).

¹⁰ 黃炎培. 《職業教育論》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9 年, 第 166 頁.

¹¹ 黃炎培. 《職業教育論》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9 年, 第 167-168 頁.

¹² 黃炎培. 《職業教育論》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9 年, 第 59 頁.

中國近代實業教育向職業教育的轉向與社會形態、學校制度的更迭有著緊密的聯繫。實業教育和職業教育這兩個名稱都出現得稍晚且幾乎同步。1904年，山西農林學堂總辦姚文棟就把實業教育稱為職業教育。姚文棟在《添聘普通教習文》中寫道：“論教育原理，與國民最有關係者，一為普通教育，一為職業教育……”就目前文獻資料看，這是“職業教育”這一名詞的最早出現¹³。

20世紀初期，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其“教育即生活”、“做中學”等教育理念對中國教育的改革和實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15年，黃炎培到美國對美國教育進行了深入考察，得到了極大的啟發，回國後開始積極提倡及宣傳美式職業教育。1917年5月，黃炎培等48名教育界和實業界人士在上海發起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1918年，黃炎培認為：“用教育方法，使人一方獲得生活之供給與樂趣，同時盡其對群之義務，名曰職業教育”，並宣佈職業教育分類為農業教育、工業教育、商業教育、家事教育和專門職業教育等五類。¹⁴經過這些教育家的努力探索，以黃炎培等人成立中華職教社為旗幟，職業教育的稱謂開始為教育界大部分人所接受。從國家政策層面上看來，北洋政府於1922年頒布實施的壬戌學制確定了職業教育的重要地位，正式用“職業教育”一詞取代了“實業教育”，完成了實業教育向職業教育的轉型，“職業教育”正式取得官方地位。此後，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在實踐和理論研究中前行，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著日本侵華，時局動蕩，職業教育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職業教育的稱謂卻一直保持到了1949年。

2. 建國初期至社會主義探索時期(1949-1966)

新中國成立後，職業教育這一稱謂被扣上了資本主義的帽子，作為一種專門教育類型的職業教育消逝了。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蘇關係破裂。毛澤東開始深刻地意識到，中國不應該完全照搬套用蘇聯的模式，而是得“兩條腿走路”。1958年5月，天津成立了全國第一所半工半讀學校。此後，手工業中學、農業中學、工業中學等具有職業性質的中學迅速形成了一定規模，職業教育在辦學實踐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恢復。當然，在“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要求下，所有的學校都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的課程，“職業教育”與“教育”並沒有明顯

¹³ 李藺田, 王萍. 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19, 360, 562.

¹⁴ 黃炎培. 《職業教育論》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9年, 第279頁.

區別，而是成為了同義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這類教育被強加上資產階級雙軌制的帽子，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職業教育這一稱謂再次銷聲匿跡。¹⁵

3. 改革開放后

改革開放后，教育領域的紊亂狀態開始得到了撥亂反正。“職業教育”這一名稱又開始復興。隨後，圍繞著是使用“職業技術教育”還是“職業教育”，學者們展開了一場激烈且持久的爭論。

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使用的是“職業教育”，1982年《憲法》又以“職業教育”代表這一類教育活動，並列入了國家教育事業組成部分中。但當時這類教育在黨和國家的檔中先後出現了多種與憲法不同的稱謂。如1980年曾稱為“職業、技術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或“職業技術教育”，在1983年後統稱為“職業技術教育”而廣泛沿用。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里，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都使用了“職業教育”的名稱。然而，關於職業教育這一名稱的爭論並沒有結束，許多場合仍在使用“職業技術教育”。如1991年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中採用“職業技術教育”名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佈的學科目錄中使用的稱謂是“職業技術教育學”。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1996年9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採用“職業教育”名稱，並以法律形式確立了“職業教育”的官方地位，此後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等官方檔中都只有職業教育的表述。

4. 新世紀之交

1996正式頒布的《職業教育法》標示著“職業教育”“技術教育”“職業技術教育”三者之爭暫時告一段落，“職業教育”再一次成為中國統稱這一教育類型的綜合概念。儘管頒布的《職業教育法》使用的是“職業教育”這一概念，但“職業技術教育”的使用仍然很廣泛，而職業教育的名稱之爭則從之前的三者之爭演變成了“職業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二者之間的爭論。

有學者指出，“職業技術教育”這一稱呼之所以不科學，是因為其語法及邏輯紊亂，它可被理解為有關職業的技術教育，也可被理解為職業教育中的技術教育，很容

¹⁵ 孟廣平. 當代中國職業技術教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21.

易產生誤解。因為職業教育在內容上其實已包括了技術教育，技術教育只是職業教育的一個部分，所以不必再用“職業技術教育”來表達與職業教育相同的概念。¹⁶根據國家教委職業技術教育中心所編著的《職業技術教育原理》一書中提出的將技術分為職業的與非職業的觀點，有學者認為很牽強也沒有必要，因為並不存在非職業的技術。在職業二字後面加上技術，顯然是在畫蛇添足。¹⁷

5. 21 世紀以來

有學者指出，鑒於國家已經在法律上確定了職業教育的名稱，在宏觀上對職業教育的稱謂不宜改變。但作為學制系統的職業教育，應改名為技術教育；作為非學制系統的職業教育，應改名為職業培訓。¹⁸當然，也有學者認為職業教育概念已經包含“職業和技術教育”、“職業教育和培訓”、“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等以上各個術語的含義，所以建議在今後一切正式與非正式的檔、報告、新聞和學術論文中統一使用“職業教育”一詞。¹⁹

在 2014 年 5 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檔後，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等六部委聯合在 2014 年 6 月印發《〈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的通知》，明確使用“職業教育”的名稱，全篇檔里無“職業技術教育”的表述。2014 年 5 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2019 年 1 月 19 日《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實施方案》，2019 年 2 月 23 日的黨中央國務院發佈的《教育現代化 2035》等都使用的是“職業教育”這一稱謂。2022 年 5 月 1 日，重新修訂後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通篇俱為“職業教育”的表述。

IV. 技術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

1. 技術教育

新中國成立后，出現了“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的名稱之爭。1949 年，新政協籌委員會在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教育章”時，朱德、

¹⁶ 李守福. 職業教育導論 M.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14.

¹⁷ 孟景舟. 文本之誤: 職業教育的語言學與歷史學視角(下)—職業教育的內涵與正名 J. 機械職業教育, 2005(11):3- 5.

¹⁸ 孟景舟. 文本之誤: 職業教育的語言學與歷史學視角(下)—職業教育的內涵與正名 J. 機械職業教育, 2005(11):3- 5.

¹⁹ 王川. 職業教育的概念、學科及學科框架 J. 職業技術教育, 2007(34):11- 14.

李立三、馬寅初、黃炎培等領導人建議將“發展職業教育”寫入《共同綱領》，但是有不少持反對意見者認為，職業教育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蘇聯沒有職業教育只有技術教育；並且新社會人人都享有勞動的權利，不存在謀求職業崗位的問題，需要的是不斷提高工作中的技術，技術佔主要地位，應命名為“技術教育”。黃炎培也表示，只要不因為名稱關係而同樣能發展職業教育，稱謂變化可以接受。因而新政協正式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指出“注重技術教育”。隨著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在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文化中，“職業”一詞被“工作”取代，致力於培養革命實業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將中專、大專、技工學校乃至本科通過“專業”連接成了一個整體，即單軌制和職業化。技術教育一詞也取代了職業教育，作為一種專門教育類型的職業教育名稱消逝了。

2. 職業技術教育

1977年，教育領域的混亂狀況開始得到了撥亂反正。1981年，中央辦公廳致電教育部，請其考慮將三分之一左右的普通學校改為中職學校。但當時教育部中並沒有一個專門的司來承辦這件事情，是叫“職業教育司”“職業技術教育司”“技術與職業教育司”等存在著許多爭議，后暫定為了“職業技術教育司”，這實際上是技術教育向職業教育轉化過程中雙方爭論的“綜合產物”。²⁰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檔中，將普通高等教育以外的所有培養專業技術人才、產業技術工人及普通城鄉勞動者的教育制度，統稱為職業技術教育。1991年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中採用“職業技術教育”名稱。改革開放後進行的教育結構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對實業教育制度的復歸。似乎一切都回到了20世紀初的起點上，但不同的是，一個新的名詞“職業技術教育”將“實業教育”一詞取代了。

關於職業技術教育名稱的由來，黃炎培先生之子、全國政協委員、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副理事長黃大能對職業教育“正名”之事也非常認真，他在文章中寫到：“那麼，這個職業技術教育的名稱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可以直率地講，可能有這樣幾個原因：其一，對於職業兩字的錯誤認識，認為在計劃經濟中，社會不存在失業問題。所以以前蘇聯也沒有職業教育這個名稱。其二，當時有一個固執成見和狹隘推測，認為中華職業教育社幾十年來『霸佔』了職業教育這一領域，要衝破這種『霸佔』，個別教

²⁰ 孫震瀚，時任職業技術教育司副司長，隨從胡啟立調查組調查南方四省教育改革情況。

育界領導認為，若把職業教育改成職業技術教育，就能衝破這一壟斷。所以不惜置職業道德在職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於不顧，硬塞進『技術』兩字，成為『職業技術教育』。其三，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檔中，把『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並列存在，於是有些人不顧邏輯上的不合理，把兩個截然不同內涵的教育名稱，合併成『職業技術教育』，上述原因造成今天仍有不少單位和不少書刊的名稱仍沿用『職業技術教育』這一錯誤名稱。即使國家已立了『職業教育法』，統一了稱謂，一時仍轉變不過來。這看來似乎只是一個名稱問題，是一個小問題，實質上對職業教育含義是一個歪曲。無法正確下職業教育的定義，所以不解決這個問題，無法認為在中國已普遍統一了認識.....我不能不再度提出統一正名問題.....”。²¹

自此，學者們圍繞著是使用”職業技術教育”還是使用”職業教育”，展開了一場激烈且持久的爭論。最終，1996年《職業教育法》的頒布，將官方的地位賦予給了“職業教育”。199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採用“職業教育”名稱，正式放棄了職業技術教育的名稱。此後官方的檔中也找不到職業技術教育這樣的表述。但法律形式的裁決，並沒有也不可能平復這一爭論。職業技術教育這一稱呼仍在職業教育實踐和研究中被廣泛使用。2002年國發（2002）16號檔中，還特別要求各級各類職業學校應該統一更名為職業技術學校，高等專科學校、獨立設置的成人高校應該逐步升格，更名為職業技術學院，今天全國各地的職業技術學院就是如此而來。2005年11月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說的職業教育是個統稱，它既包括技術教育也包括技術培訓，既包括職業教育也包括職業培訓，既包括中等職業教育也包括高等職業教育。”²²在理論界也是如此，在職業教育領域兩份重要的學術期刊中，也被冠以職業技術教育，其分別是《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直至今日，“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仍然代表著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者的常用術語。

V. 結語

事實上，從類型教育的角度，對與普通教育相對的職業教育進行認識和命名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在近現代職業教育的起源地的西方國家中，職業教育

²¹孟廣平. 祝賀著名職教專家嚴雪怡先生從教五十周年暨八十華誕J. 機械職業教育, 1999(11).

²²溫家寶. 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1/13/content_3772626.htm, 2014-05-07.

這一名稱也是飽受爭議的。正因為這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才會用“技術與職業教育與培訓”這樣一個複雜的名稱來表示“職業教育”。

中國職業教育名稱的演變與爭論可以歸為一種複雜的文化現象。這其中既包括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突，也包括各外來文化之間的較量。這些衝突與較量，使得職業教育的名稱演變最終成為了一個語言學的問題。

我們認為，對中國職業教育名稱的客觀認識應該在梳理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的基礎上進行，立足於當代的職業教育實踐，著眼於未來的職業教育發展。就當前來看，我們應該圍繞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這一前提，與普通教育為參照來進行探討職業教育的特徵，諸如是學科知識還是工作知識？是理論導向還是實踐導向？是產教分離還是產教融合？培養的人才是面對模糊的崗位還是確切的崗位；僅限學歷教育還是學歷教育與繼續教育並舉？是重視理論型教師還是雙師型教師？是堅持學歷教育還是堅持學歷與技能證書並重？只有對作為類型教育的職業教育特徵和本質屬性認識比較清晰了，那麼對中國職業教育名稱的認識自然也就柳暗花明、水到渠成了。

參考文獻

1. 專書及網站

- 黃炎培. (2019). 職業教育論.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李藺田, 王萍. (1994). 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守福. (2002). 職業教育導論.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劉桂林. (1997). 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孟廣平. (1993). 當代中國職業技術教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全漢昇. (2016). 中國行會制度史.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 俞啟定. (2012). 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吳國榮. (2015). 清末民初職業教育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翟海魂. (2008). 發達國家職業技術教育歷史演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溫家寶. 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1/13/content_3772626.htm, 2014-05-07.

2. 論文

- 孟景舟. (2011). 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百年之争. 职教论坛(16), 8-10.
- 孟景舟. (2005). 文本之誤: 職業教育的語言學與歷史學視角(上)——職業教育名稱之爭的原由. 機械職業教育(10), 3-5.

孟廣平, 楊金士. (1999). 祝賀著名職教專家嚴雪怡先生從教五十週年暨八十華誕. 機械職業教育(11), 2.

王川. (2007). 職業教育的概念、學科及學科框架. 職業技術教育(34), 11-14.

张宇. (2012). 论“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称谓的转变.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 258-263.

Date of Submission: July 27, 2022

Date Review Completion: August 30, 2022

Date of Publication: October 30, 2022

About the Authors



Yang Yongbing obtained his M. A and Ph. D in History from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China. 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He has been engaged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undergraduate majors of full time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17years.

楊永兵，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碩士、博士，現任教於雲南大學職業繼續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從事全日制職業教育本科專業教學和研究工作 17 年。



Mao Lipin is a graduate student of the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China. S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ourses.

毛莉萍，雲南大學職業與繼續教育學院 2019 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職業技術教育課程研究。



Gong Zil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is currently teaching at the School of Vocational Continuing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China. She is mainly engage in educat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龔自力，副教授，現任教於雲南大學職業繼續教育學院，主要從事教育經濟研究。